

郑振铎 1957 年甘肃行记暨敦煌考察报告

王睿颖 刘进宝

(南京师范大学 历史系, 江苏 南京 210046)

[摘要]郑振铎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文献学家、考古学、翻译家,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之一。1957年4、5月,郑振铎任文化部副部长时,曾率队赴甘肃考察,就甘肃的文物考古工作、古建筑保护,敦煌石窟的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等,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与建议,后来的研究者对此关注不多。本文利用近年刊布的郑振铎日记及有关信件、档案,将其钩沉,挖掘其重要价值及意义。

[关键词]郑振铎;甘肃行记;敦煌考察报告

[中图分类号]K8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02-0050-03

郑振铎(1898~1958),生于浙江温州,原籍福建长乐,字西谛,有郭源新、宾芬等多个笔名,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文献学家、考古学家、翻译家,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五四运动期间,与瞿秋白创办《新社会》杂志,倡导新文化运动。1920年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创办《文学周刊》与《小说月报》。早年游学英、法等国,回国后,先后担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教授与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在上海成为孤岛时期,致力于抢救古籍善本书,为我国的古籍文献事业和图书馆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1949年以后,他历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考古所副所长、文化部副部长、文物局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等职务,多次率团代表国家出国访问,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和外国文学的发展做了很多实际有益的工作。1958年10月18日,在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殉难。

1957年4、5月,作为主管文物和博物馆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先生曾率队赴甘肃考察,就甘肃的文物考古工作、古建筑保护,敦煌石窟的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等,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与建议。但由于次年郑振铎即因飞机失事而遇难,未能将其意见付诸实施,而后来的研究者,也对此关注不多。因此,有关郑振铎1957年的甘肃之行及学术活动,或未予涉及,或语焉不详,一笔带过。我们主要利用近年刊布的郑振铎日记及有关信件、档案,将其钩沉。

1957年4月中旬,郑振铎先生等11人赴西安考察,完毕后,考察团部分成员郑振铎、何遂、资耀华、蔡方荫、张丰曹一路西行于4月27日夜抵达兰州,当时的甘肃省长邓宝珊等人在车站迎接。在兰州参观考察图书馆、博物馆后,考察团于5月1日出发到敦煌去。伴随着一路考察,他们于5月5日傍晚到达敦煌,常书鸿所长等人在研究所门前迎接。在接下来的几天中,考察团在常书鸿、段文杰和研究所同志的引导下系统地参观了莫高窟,查看了榆林窟描摹图片。在参观的空隙,考察团召集研究所的同志开了几次小型座谈会。继5月9日的会议后,考察

团于5月10日晨离开莫高窟,一路飞驰于5月12日中午到达兰州,5月13日在兰州稍事休息并做了在甘肃的考察汇报后,5月14日离开兰州。

郑振铎先生等在敦煌只有五天,在甘肃也只有十多天。就是在这短短的十几天时间中,郑振铎先生深入基层,认真考察研究,并及时地将自己的想法利用开会之机讲出来,其中在敦煌的几次座谈会的情况,郑振铎日记中有大致的记载。如:

1957年5月6日(节录):

晚七时半,向研究所的同志们讲话,最以三事:保护洞窟,不让再剥落、破坏下去;发扬、光大民族的艺术传统,创作新壁画,培养后进;研究并编著有关敦煌及其附近的佛教艺术与考古工作。拟印行《敦煌》二百四十多本,其中“图录”占一百二十多本。其余为汉文古籍、佛教经典、民间文学、杂文书及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图籍等。“变文”一册,既可付印。在研究工作上所需资料,我答应尽量的供给他们。他们颇为满意而感动。

1957年5月8日(节录):

夜,开座谈会,代表、委员们都讲了话,到深夜十一时半才散。

1957年5月9日(节录):

下午五时,约敦煌研究所的编委会(扩大)谈话,说明编辑《敦煌》及《中国胜迹图谱》的计划。下午七时半,开座谈会,听取研究会职工们的意见。到十一时许才散会。

在敦煌,他惊诧于敦煌宝库艺术的精湛和博大,深深地为这些艺术作品所折服,流连忘返之余他将这种欣喜赞叹的心情诉诸笔端,告诉他在远方的亲人和朋友,同时也从美术史、艺术史的角度,控诉了王道士的罪行:

昨到敦煌来,在夕阳的微光中,即作了一次巡礼。今天又看了一天,赞叹无已。

五日傍晚到了敦煌千佛洞,即到邻近各洞参观。壁画和塑像均精采(彩)之极!“百闻不如一见”,见到了才知道其弘伟,美丽。住三天,只是匆匆一瞥,走马观花而已。要细看,得住三年!在千佛洞住了四天,看了不到两百个洞窟,但已叹观止矣!搞美术史的人,如果不到敦煌来,那末,一定不会搞得好的……虽然来回走了八天,却只看了四天,却是十分值得的!世界上那(哪)有那末丰富的北魏到元代的壁画和塑像呢!壁画几乎洞洞有之,共凡四百八十窟,如展开这个画卷,这画卷就有二十五公里长。塑像保存得完好的,只有几十个洞,但实在了不起!现在如得一宋塑,已经是千万之喜。这里却有北魏塑像一百多尊,唐塑像一百多尊呢!那不是一个大宝库么……

我在四月中到了西安,在五月初到了敦煌千佛,所见至多。千佛洞是久想一去的地方,今乃得如愿。在途中走了五天才到,几乎览尽“河西走廊”的风光。千佛洞实是中国艺术的一个大宝库。“见面胜如闻名”,见了之后,才知道“展览的模式”还不能表达其胜处的万一也。壁画固然弘伟,塑像犹为精绝。集二百多尊北魏、隋、唐、五代、宋的塑像于一处,其重要是无可比拟的。在那里住了四天,足不停步,目不暇给,欢喜赞叹,欣赏无已!只恨时间短促耳。

在路上走了二十多天,西安、兰州停留了十多天,到敦煌走了五天。但看了千佛洞的光芒四射的壁画之后,觉得那五天长途跋涉不是没有很大的报酬的。在夕阳的金光里,到了千佛洞。来不及休息,掸了掸尘土,就到邻近的几个洞里走走。“见面胜如闻名”,果然是弘伟之至!面对着北魏、隋、唐、五代、宋的名笔,不知要怎样赞叹才好!从来没有见到过那末丰富,那末美妙,那末生动的人物画过,这里可以说是民族绘画的优良的集中地。学艺术的人如不到这里来巡礼,那就等于没有见到过民族绘画里的最精彩的创作。我们的绘画传统,实在是伟大之至!那些佛、菩萨像,那些供养人像,乃至那些马匹、骆驼,那些亭台楼阁,无一不是杰作。仔细的研究

人物的脸部表情,乃是其手的姿势,都是十二分的可喜动人的。到北京展览的摹本,只不过是依稀仿佛,存十一于千百而已,绝对不足以“尽”千佛洞壁画的胜迹也。其塑像也是十分美好的,和王道士所装修的恶俗不堪的新塑对照起来,便知道唐、宋雕塑家们的手法是如何的高妙了。王道士毁了无数唐宋塑像而代之以恶像,实在万死不足艺术罪也。

在敦煌,郑振铎有感于常书鸿、李承仙以及敦煌研究所的其他同志驻守敦煌、以敦煌为家、献身敦煌的精神,欣然提笔写下了:

常书鸿、李承仙二同志,同心协力,在大戈壁沙漠的一块小绿洲上,为继承、发扬祖国的艺术的优良传统,而艰苦地奋斗了十五年之久,其苦心孤诣(诣)与热爱祖国的艺术的精神,至可钦佩,敦煌千佛洞能有今天的辉煌,和他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我于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到九日,在千佛洞参观,于欢喜赞叹之余谨志数语,以颂他们的功德。

敦煌千佛洞,心向往之者久矣。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始得从兰州到此视察。途经武威、张掖、酒泉、安西、玉门,五日始达。行装甫卸,即在夕阳的黄金光里,到古洞里巡礼。心意沉酣,喜欢赞叹。古今中外,得未曾有。洞凡四百八十,均有北魏、隋、唐、宋、元的壁画及塑像。走马看花地看了四天,尚未能及其半。千年之美,毕集于斯,诚可谓为民族艺术的大宝库也。研究民族艺术的人,如不到这里来细心学习,至少是一年半载罢,则决不能说是已经明白了中国艺术的优良传统。每一个洞窟的壁画,每一尊丰满圆润的塑像,乃至佛的背光,金刚座的饰图,供养人的大小画像,无不足令人欣赏无已,站在那里,久久地走不开去。若移任一洞窟的壁画到任何一地去,将无不会大为哄动,成为一城一省之绝大骄傲。某一个地方如果存在着像这里所有的任何一堂(尊?)唐宋塑像则也将立即成艺术家巡礼的一个中心了。

5月13日回到兰州后,考察团专门停留一天,在兰州和有关同志交换意见,并把在甘肃的考察情况进行了汇报,这一情况,在郑振铎的日记里也有记载:

五月十三日(一)阴,偶见太阳。下午,雨。
六时半起,写信给潘景郑、吴文良、孙实君,

即发出。整理行装。九时,到五泉山公园,循游廊上山,看东龙口的水,从石罅里涓涓流出,淙淙有声,如在深山听溪水声。至卧佛殿,又上至千佛阁。有天顺、嘉靖、万历三碑,又有康熙时碑。民国二十五年又重修过。天顺碑已称“重修”,则其来源久矣。所谓千佛乃是壁画,作风颇古,然方之敦煌千佛洞,则逊乎小哉。其风格却是一脉传授下来的。至西龙口,泉水较小。在嘛呢寺喝茶,水甚甘。新壁画颇多佳者,黄胄作的藏族青年们骑马相逐的一幅,尤好。……座谈到深夜十一时。我提出甘肃省应该注意的事:(1)古城遗址多,要保护;(2)石窟有七十多处,要保护;(3)注意古墓葬的发掘;(4)普查工作的进行;(5)废铜、废纸的如何选拣;(6)修复工作,以保固为主以不改动原来形式为原则;(7)出版问题,《中国陶磁图录》和《中国胜迹图谱》二书,请协助编辑;(8)敦煌研究所及嘉峪关、炳灵寺应行处理的事项。邓、张也谈了一下。归旅邸后,即睡。一夜睡得很好。写信给孙家晋及舒。(昨夜有大风)

关于5月13日在甘肃的考察汇报的具体情况,在甘肃省档案局243-2:21号卷也有记载,为便于读者了解,现将其转引如下:

郑振铎代表何遂委员等视察甘肃的汇报纪要
郑振铎代表:

(一)关于文物考古工作

甘肃的文物特别丰富,文物考古工作的任务特别重要。甘肃的文物考古工作由于领导的特别重视和工作人员的努力,做得很有成绩,不过有的方面也还有些漏洞和问题。

大建设和保护文物之间的矛盾,在甘肃特别突出,如很多新建工地往往正是古城遗址,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和更好地做好文物考古工作,我有几点意见:

1.为了既不耽搁建设,又能保护住文物,基建选地址时,可否采取由省文化局与基建单位签订协议书的办法,双方协商好了再办。中央就是采用这个办法的。

2.注意废铜废纸,如这方面经费不够,可由文化部拨一部分款(甘肃的废铜废纸发现了很重要文物,如明抄本的“北堂书钞”等等)。

3.古城遗址的保护非常重要,目前限于力量,短期内还不能发掘,需要靠地方和群众加

以保护(古城遗址在甘肃已发现了很多,如张掖黑水古城,安西销阻城,桥湾,布隆吉,酒泉附近等处都是很重要的古城遗址,将来发掘中很可能找到如汉简等极珍贵稀见的文物),如果注意不够,就会因兴水利,扩大耕(地)面等,受到破坏,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在这些地方进行建设或扩大耕(地)面时要先研究一下再动手。

4.甘肃的汉唐墓最多,彩陶也丰富完整,考古发掘的希望很大,现在的古墓葬的清理工作,还有些粗糙,今后要做得更科学一些,这需要省上帮助再训练培养一些考古人员。

5.石窟的保护要尽力做到不塌、不漏、不裂,采油、采煤、搞水利都会造成破坏,希望注意到这些问题。刘家峡的水库工程与炳灵寺的保护有矛盾,因削减了水利工程经费,水利部取消了筑扩土坝的计划,炳灵寺是否需要“搬家”请省上考虑向中央提出意见。

6.甘肃的古寺院碑碣很多,对重要的古寺要特别注意保护起来,“已经死了”的庙宇,最好不要再招僧道进去住了。

(二)关于古建筑的补修看管工作

1.修缮是根据勤俭办事精神,目前以能做到保护住,使它不塌不漏为主,整修中要以不改变原来的形式为原则。嘉峪关和敦煌石窟目前非加修补不可,希望省上多给帮助,现在希望给敦煌供应一部(分)钢筋。

2.现有的几个文物馆保管所,人少不好看管,建议由主管部门与当地农业社联系,订立协议,由农业社负责,委托社的五保户看管,由文化部补助一些钱。花钱不多,既看管了文物,又对群众有少许补助,请考虑这个办法(有的省实行了这个办法,效果很好)。

3.普查工作很辛苦,现在已由省公布了第一批名单,希望不久公布第二批名单,并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一些困难。

4.招待问题是敦煌、麦积山的很大困难,今后参观人员日增,住房不够,没有人招待,敦煌的艺术工作人员用了很大一部(分)精力做了招待工作,希望帮助抓紧解决房子的问题,敦煌需建房二三十间,约需款十五万元左右,请省上研究解决。

又嘉峪关的经费已拨下了,请注意专款专用。

5.我们需编印《中国胜迹图谱》其总需要甘

肃负责编辑的有五册,又计划编印《陶瓷图录》了,2册其中的彩陶图录一册,也由甘肃负责编,并希抓紧这项工作。

何遂委员:

为了依靠群众保护文物希望注意多做宣传教育工作,使广大群众深刻了解保护文物的重要意义。为了使古城遗址尽量保护住,希望一发现“苗头”即刻告诉文化部。

张主任:

敦煌壁画中有很重要的器物工具,如骆驼拉车,画上就有的,希望在这方面注意,更加丰富敦煌文物研究工作的内容,对敦煌文物研究所长期辛勤工作的同志要给与更多的鼓励,使他们更加安心的工作,有机会的时候要注意调他们到外边去走走,生活上给予调剂,敦煌文物研究所没有医生,孩子上学也成问题。

美中不足的是,这份记录没有记载具体的时间和地点。结合郑振铎日记中关于会议发言内容的记载,我们认为该记录可能是郑先生日记中5月13日在省长邓宝珊宅晚饭后座谈时所记。纪要中提及的何遂委员,一生待人耿直、热诚,不近烟酒,惟酷爱书画、文物,他惟一的财产就是大量的古文物和图书,曾先后全部分赠给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历史博物馆、南京博物馆和天津图书馆。仅1950年捐赠给上海历史博物馆的古文物就达6895件。为此,陈毅市长、潘汉年、盛丕华副市长专函致谢,国家文化部发给了褒奖状。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司法部部长、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纪要中提到的张主任,应为张丰胄,他解放前曾任江苏东海县县长,陕西省政府秘书,潼关县、富平县、陇县县长,重庆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少将研究员,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医学校总校政治部少将主任,复旦大学教授。1949年参加“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工作,同年作为邵力子先生秘书兼“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联络员参加国共和谈。建国后历任政务院秘书厅秘书,政务院参事室秘书、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参事

室办公室副主任兼国务院法制局办公室副主任。在纪要中称为“张主任”正好是这一段时间。1973年7月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

郑振铎一行人在甘肃提出的建议,开启了甘肃文物保护和宣传新的一页,其中计划编辑出版一套多卷的《敦煌莫高窟全集》,已于1957年邀请国内考古、历史、艺术史、建筑史等方面20多位专家组织了编辑委员会,由郑振铎、夏衍副部长等相继召开过多次会议,商讨和制定规划,做了不少准备工作。后来,具体的工作因十年动乱中途停顿。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从1994年以来就着手进行的大型《敦煌石窟全集》,在段文杰和樊锦诗以及一大批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也在今年(按:2004年)全部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是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郑振铎、王冶秋两位文物局长和常老的愿望。”

这次考察中其他的建议因为某些原因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后来由于郑振铎先生1958年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而被长久地搁浅了。

此后,文化部十分关心敦煌莫高窟的工作。经过反复酝酿,在广泛听取各方面专家意见的基础上,1962年决定组成文化部敦煌莫高窟考察工作组(简称考察组),前往当地进行实地考察。由继任郑振铎分管文物博物馆工作的徐平羽副部长担任考察组组长,参加这个考察组的有著名雕塑家、中央美术学院刘开渠教授,美术理论家王朝闻教授,考古学家、北京大学宿白教授,古建筑学家陈明达教授,文物博物馆研究所技术人员胡继高,中国科学院治沙队治沙专家李鸣岗、赵松乔、马载涛,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王书庄和甘肃文化局副局长韩生本、处长吴怡如。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考察,徐平羽考虑到抢救工作的迫切需要,于9月5日又邀请铁道部第一设计院地质工程师张征海、隧道组长谢英参加,文化部文物局干部嵇春生担任考察组秘书,随组工作。在敦煌,徐平羽和考察组成员们提出的对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和加固的具体实施意见和方案,就是在郑振铎1957年提出的“以保固为主、以不改动原来形式为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的。考察组回京后提出《关于加强敦煌保护工作、出版工作和充实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意见》,也和郑振铎1957年的考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注 释]

本文有关郑振铎日记部分均引自郑振铎:《最后十年》,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

郑振铎著,刘哲民、陈政文编:《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340页(5月7日至夏鼐明信片)。

刘哲民编著:《郑振铎书简》,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108页。

林申清整理:《郑振铎致潘景郑论书尺牍》,载《历史文献》第四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87页。

郑尔康:《郑振铎家书》,《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4期。

郑振铎题词,据常书鸿:《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图版录入。

前半部分据郑振铎:《郑振铎日记全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图版录入。后半部分引自崔石岗:《郑振铎的敦煌情节》,《图书馆建设》,2004年第4期。

谢辰生:《坚持敦煌精神,弘扬敦煌文化——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60周年》,《中国文物报》,2004年9月17日第5版。